

## “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巴基斯坦民粹主义的三维 视角分析\*

徐波 新罗大学

### 内容提要

中巴两国的深厚友谊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给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展开的各项合作提供了政府层面的巨大支撑，也使中国和巴基斯坦正继续向着“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心，以瓜达尔港、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和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经济合作布局，实现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的目标继续前进。不过，两国关系也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面临着一些挑战，其中巴基斯坦国内的民粹主义问题逐渐显现，如果放任其泛滥，将有可能导致中巴经济走廊等各项合作面临巨大威胁。因此加强对巴基斯坦民粹主义的基础研究对于继续发展中巴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保证中巴经济走廊的各方面既得成果和长期规划得以顺利实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整理回顾了当前的民粹主义理论研究现状和不足后，针对巴基斯坦国各方面的特殊性，创新地选取了阶级、宗教和地域三维视角来对其民粹主义进行了剖析，深刻起底民粹主义滋生繁衍的营养源。本文认为从阶级视角看，巴基斯坦民粹主义有着鲜明的阶级对立和斗争特征；从宗教视角看，巴基斯坦的民众和宗教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心理；从地域视角看，巴基斯坦伊斯兰传统社会结构决定了个体对宗教、家族和更小范围地域等的忠诚度超过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度。

**关键词：**一带一路；巴基斯坦；民粹主义；三维视角；中巴经济走廊

\* 作者曾于2020年10月在韩国中国文化学会举行的学术会议上对本文的核心内容进行过阐述。

## I. 绪论

巴基斯坦与中国就地缘层面上是好邻居，就两国关系层面是好朋友，就经贸合作以及反恐合作方面是好伙伴。1951年5月21日，巴基斯坦成为首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伊斯兰国家，中巴由此开启了崭新的外交合作关系。冷战期间，巴基斯坦为维护国家安全而主动地向中国谋求外在的同盟关系，并顶住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实施了积极的对华政策，并在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后，与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建立了“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4月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建议“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心，以瓜达尔港、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和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经济合作布局，实现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人民网 2015)。在双方共同推动下，两国签署了51项合作协议，强有力推动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刘婧 2016)。在2016年11月13日，巴基斯坦的中资港口瓜达尔港正式开航。中巴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带动其他领域的合作全面发展，不管是经贸合作还是基础设施或者能源合作上都取得了许多成绩。而且中巴两国在以安全和防务领域为重要合作内容的成果大大地促进了中巴友好关系的发展，也从侧面有力地稳定了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现有秩序。不过，尽管中巴两国人民友谊深厚，随着国际格局的不断变迁，中巴关系和各领域的合作交流也在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中国对其外交战略做出新一轮的思考与探索。从外部而言，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掀起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逆流横行的背景下，民粹主义区域性色彩日渐浓厚，带来的消极影响愈加严重。从内部而言，巴基斯坦一些地区的民粹主义组织如俾路支省、信德省、吉尔吉特等地区的民粹主义逐渐抬头，其中一些地区的组织还有着一定的恐怖主义性质。这些组织影响着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同时也影响着中巴两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当前亟需加大对巴国民粹主义研究的力度，厘清其产生根源、成长过程，并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通过这些基础研究，以寻求消除其对中巴合作不利影响的办法，进一步推动中国在巴国的发展合作

营造积极的外部氛围。从理论角度来讲，巴基斯坦的民粹主义和其它国家及地区的民粹主义无论是从历史背景、发展特点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且当前的民粹主义相关理论研究还无法对此进行合理科学的解释。因此，研究巴基斯坦的民粹主义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将着重于研究解决以下问题针对巴基斯坦民粹主义的各种特殊背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巴基斯坦民粹主义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理清这些特点将对中巴关系和“一带一路”为背景的中巴合作带来什么样的积极影响？本文将采用文献研究的方式，并结合三维视角分析方法来展开研究，其目的在于分析巴基斯坦民粹主义的特点。首先对现存的民粹主义研究理论进行整理回顾，并指出其对于解释巴基斯坦民粹主义的不足之处；其次将说明巴国民粹主义的发展现状，并解释说明三维视角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再次将基于三维视角对巴基斯坦的民粹主义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结论性建议。

## II. 现存民粹主义研究理论回顾

当前民粹主义现象研究的视角与范式，常常建立在以欧美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之上。民粹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曾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特征，既涉及观念意识层面，也包含具体发生的社会运动，并引发了各国学者的广泛研究。早期民粹主义的研究起源于美国人民党和俄国村社社会主义早期实践的演变，其根基在于颂扬“大众”的神圣性，尤其是就大众的价值与那些精英价值相比较得出这一结论。关于民粹主义众说纷纭，但达成共识的特征就是以服务大众为名义，得出反精英、反体制的结论。但“大众”这一概念本身就极其复杂，并非是一个独立概念，其形成还来源于民粹主义者对其他概念的部分认同。

### 1. 民粹主义研究的主要观点

民粹主义研究的主要学者有爱德华·希尔斯、伊夫·苏瑞尔、托丘尔多·迪·特拉 (Torcuato Di Torcuato)、彼得·沃利斯 (Peter Worsle

y)、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欧内斯特·拉康(Ernesto Laclau)以及卡斯·穆德(Cas Mudde)等。在希尔斯看来,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统治阶级,垄断着社会权力、财富、教养、文化以及话语权。在统治阶级所实施的统治过程中,阶级对立不断发生,普遍的怨恨情绪就必然存在着民粹主义的积聚。将民族主义视为右翼激进社会思潮与运动是H.G.贝茨的观点。伊夫·苏瑞尔则反对一系列将民粹主义简化为一场右翼激进运动的观点与解释,反对将其视为对当代西方国家治理机制的批判态度。托丘尔多·迪·特拉的民粹主义研究立足于拉美发展中国家与西欧国家的对比,他对于民粹主义观点立足于中产阶级与社会现状的对立。彼得·沃利斯则从政治文化视角,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个普遍性的政治文化现象,而非特定的、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体系或者组织类型。与迪·特拉关注经济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现象不同,彼得·沃利斯不认为现代性与经济因素是决定民粹主义是否产生的根本动因。赛亚·伯林强调解释不同变种的民粹主义应从六个基本特征出发,形成一个总体性的一致观念。欧内斯特·拉康从辩证法的角度,对民粹主义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他把民粹主义视为自相矛盾的概念作为其分析民粹现象的出发点(Ernesto Laclau 1977, 173)。他认为民粹主义本质上是统治阶层中的精英(可以是阶级上或主体民族上的、也可以是特定地域的利益团体)的思想意识,是一种以“大众”作为工具的政治活动,即当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企图建立霸权地位但又无法做到时,就会诉诸或动员民众给予支持(Cas Mudde 2004, 547)。

美国乔治亚大学教授卡斯·穆德从世俗与宗教的角度,将民粹主义纳入到社会意识宗教化的分析范围。精英的“世俗化”与大众的“宗教化”之间的对立冲突符合其解释框架,即所谓“精英的腐败”和“大众的纯洁”的认识最终导致社会被撕裂为两个超越传统阶级概念的对抗群体,而政治应该基于普通民众共同意愿的表达,即“人民的意愿”,通常理解为“常识”,这是所有良好政治的原则和基础。由此,民粹主义应被理解为一种预设大众“纯洁性”与精英的“腐败性”相对立基础上的“薄中心化”的意识形态(Thin-Centred Ideology)”(Cas Mudde 2004, 547)。正是建立在这种“大众至上”、有限的、模糊且笼统的概念之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价值诉求松散地融合到了民粹主义体系中,即:反体制、反权威和本土化(Cas

Mudde 2007, 68)。

英国社会学家唐纳德·麦克雷 (Donald Gunn MacRae) 意识到, 西方理论框架下对民粹主义的研究无法完全解释民粹现象在其他地区的成因、发展与特征。在其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中, 麦克雷认为, 在一个农业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 在受到现代化、工业化的冲击与影响下, 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正确地使用了“民粹主义”这个术语, 用以宣称其行动对社群信仰和习惯的正当性, 并坚定“大众”这个概念唯一指代善良与平等。在现实层面, “民粹主义”反对一切“精英”及其概念, 是拒绝接受任何社会、政治和历史必然性的学说(Donald MacRae 1969, 168)。这一叙述是建立在西方, 特别是美国、俄国以及德国现代化过程中民粹主义成因的分析上。同时, 麦克雷发现, 民粹主义在非西方地区的现实发展与自身理论建构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特别是种族和宗特别是种族和宗教因素在东方传统文化中所塑造的传统美德、个性观念, 使西方概念下的民粹主义混杂了原始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成分(Donald MacRae 1969, 168)。而且英美等西方国家在民粹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有着长时间的民主实践, 但发生在亚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传统民粹主义并没有完整的民主经历。

## 2. 民粹主义的特点

上述学者从不同方面得出相似的认识, 归纳如下: 民粹主义的确切概念难以定义, 是一个具有强烈附着性的社会思潮, 其无法独立发挥作用。民粹主义作为“薄中心化”的意识形态, 需要依附于某种社会力量、大众传媒以及特定族群等, 才能充分发挥其召集力和动员力。民粹主义具体诉求集中于道德和伦理领域, 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 主要体现在抵制道德败坏、抵制世俗化、现代化等涵盖所有民粹主义的对立面。具体实践就是对现代国家制度、外商与企业、市场经济、全球化、工业化、大都市与国际化生活方式的全面批判。

同时通过理论回顾可得出以下三个特点。首先,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学者对于民粹主义的定义都有所不同, 既存的理论只适用于既定的某个领

域(如阶级、宗教、地域或其它时间/空间性的范围)对其民粹主义进行分析研究,而不一定对其它的领域适用;其次,不同国家的民粹主义都有其滋生的营养源和对立面,它们因其依附源和对立面的特殊性,会表现出其独一无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最后,应该从各国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入手,以源头来起底民粹主义,有几个营养源就从几个维度去剖析,以此来保证研究结果客观全面。

### Ⅲ. 对巴基斯坦民粹主义分析维度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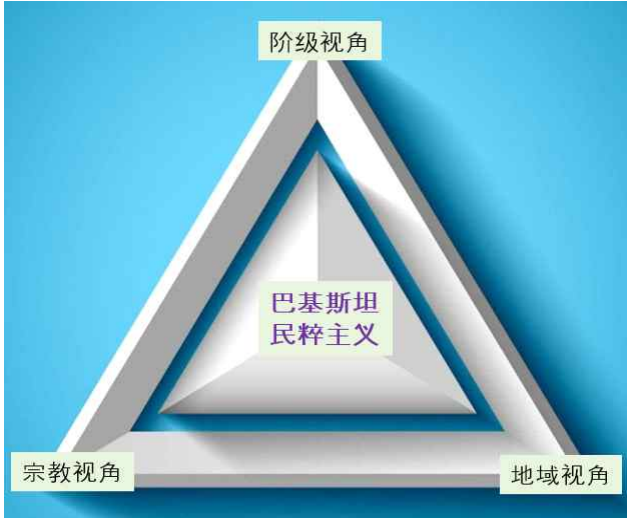
民粹主义的影响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但是主要还是表现在国内,具体表现为:首先,在政治领域恶化国内政治环境,阻碍巴基斯坦融入全球化进程。巴基斯坦自建国以来因复杂而又特殊的民族宗教关系以及中央政府在政治治理过程中由于世家政治传统带来的利益分配在区域中的不均等问题,导致巴基斯坦政坛中的地方分离主义势力和中央的国家建构势力的博弈一直都处于激烈状态。巴基斯坦国内或极端或温和的民粹主义组织的存在以及其所发起的一系列运动,对巴基斯坦本就动荡的国内政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地方的不满和焦躁情绪逐渐爆发后,民粹主义势力直指政府体制和精英阶层,这势必会带来政治危机,扰乱现有政治秩序,威胁巴基斯坦的国家政权统治。

其次,在经济领域严重掣肘巴基斯坦国内的发展。据统计,从2005财年至2015财年,巴基斯坦因安全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按照估算的这笔数目约为巴基斯坦134年间在教育领域的投资总额。因极端民粹主义势力活动所造成的破坏,巴基斯坦政府为维护国内安全而耗费了巨额的国内财政支出,这就导致政府在社会发展的其他领域的投资能力大大地被削弱,从而掣肘了国内经济增长。而从外资流入的角度来说,巴基斯坦民粹主义的发展一方面致使巴基斯坦在国际市场上的投资风险不断攀升,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估为不适宜投资之地;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带来的安全风险还严重影响了巴基斯坦的旅游业,受恐怖主义报道的影响,很多国外游客对巴基斯坦敬而远之。

再次，民粹主义活动不仅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加剧了平民的绝望和无助。相对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来说，民粹主义势力对巴基斯坦社会层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就业与社会心理两方面。在民众就业方面，持续的动乱和袭扰造成的社会安全形势不稳定，相伴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群众失业，这加剧了人民的生活贫困。没有工作，也会使得部分中下层的人因绝望、无助而易受他人煽动加入极端组织；在社会心理方面，民粹主义的产生就蕴含着反体制、反精英的内涵，民粹主义在巴基斯坦的盛行表明其国内存在阶级差距日益扩大、阶级日益固化，中下层民众对体制及精英阶层充满敌意，被割裂的社会形态越发的明显，人民与政府的离心倾向也愈发明显，社会心理更多地呈现出焦虑、压力、愤怒、抑郁的一面，不仅是巴基斯坦，目前民粹主义方兴未艾的许多国家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巴基斯坦民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因为其有着多元的、复杂、顽固并且还在扩展的滋生源。这些滋生源里，阶级因素、宗教因素和地域因素给予民粹主义的营养成分最多。这直接决定了分析巴基斯坦民粹主义需要重视其社会的特殊性，需要将宗教、民族、阶级三个维度融合于民粹主义分析中。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并没有排除其它视角对于民粹主义的重要影响，现存理论已经多次说明了民粹主义产生的多元化因素，本文也明确认识到了巴基斯坦民粹主义的有着多重的原因，是在多年的发展历程里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但是阶级、宗教和地域这三个视角能够从人、思想和空间三个维度把民粹主义的产生根源更为清晰的呈现出来，这表现在：首先，阶级视角能够把人这个最为重要的要素分为各个阶层，考量这些阶层各自的利益点，并指出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引发了贫富差距、阶层对立，由此滋生了民粹主义；其次，宗教视角从思想上层建筑角度，把巴基斯坦划又划分为不同的对立团体，从而剖析这些对立宗教团体的矛盾；最后，地域视角从空间的角度，再次把巴基斯坦分为不同的时空对立区，通过解析这些地域性矛盾，深刻揭露民粹主义的地域性矛盾源头。这三个视角能够深刻、清晰、精确地把复杂无序的巴粹拆开，因此本文选取这三个视角来分析巴基斯坦的民粹主义，能够从源头上来追溯其原因，用来解释正在发生的民粹现象的根本动机，从而为解决问题打下坚实理论基础。

图1 三维视角分析示意图



图示来源：作者根据本文的内容绘制。

#### IV. 基于三维视角对巴基斯坦民粹主义的分析

##### 1. 巴基斯坦民粹主义分析的阶级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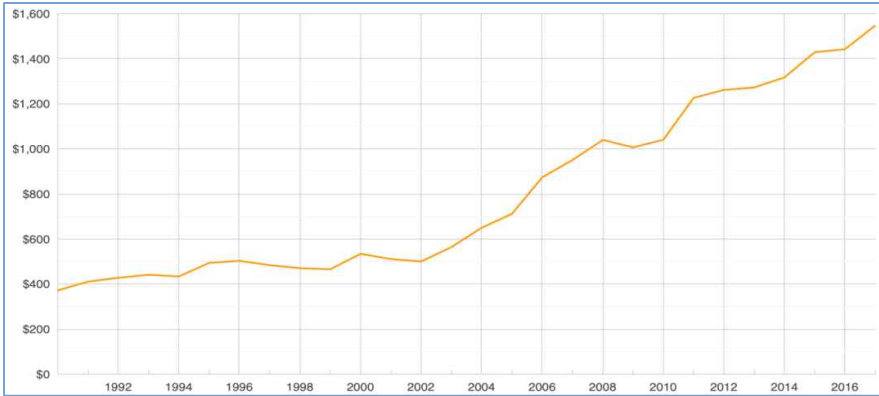
从传统的阶级分析视角看，民粹主义虽然以“大众”广泛性回避阶级，但阶级性始终是“民粹”实践的落脚点和依托。民粹主义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阶级来进行界定的(保罗·塔格特 2005, 123)。现实中，各种民粹主义派别一定有其特定的阶级基础，但就民粹主义本身而言，它应该又是没有阶级基础的(Ernesto Laclau 1977, 145)，因此出现了内在逻辑矛盾。民粹主义的一大特点：阶级上的边缘性，即被统治阶级和边缘人群。当这一阶层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时，借助公民社会的力量，民粹主义就有了产生影响力的群众基础与思想传播的渠道。

以阶层分析的视角看，巴基斯坦民粹主义有着鲜明的阶级对立和斗争特

征。巴基斯坦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一国工业化初期的指标。农业社会和封建生产关系主导巴基斯坦的经济，城市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商业。其经济社会结构长期保持着封建制度。从事政府公务员、军警、教育、金融、媒体、国营或私营企业等部门的有薪职员所构成的阶层人数相对较少，对巴基斯坦社会结构和政局影响甚微。作为一个以农业出口为作为一个以农业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巴基斯坦的农业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一直上涨，直到2015年才开始下降。即便如此，农业增加值仍长期占到GDP的20%以上。经济结构反映阶层状态。巴国上层如政府官员、军方将领以及议员多数来自传统的地主阶级，政府当中主要行政岗位被当地家族或利益团体把持，底层民众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层跨越的通道不畅，不仅抑制了社会的活力，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这种对权力、要素的垄断和封闭，反过来巩固和扩大了相关团体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为其统治的长久性奠定物质基础(Sharif.M.Shuja 2000)。这必然延续阶级斗争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与作用。

巴基斯坦精英阶层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军方。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相对弱小的巴基斯坦为了国家的生存与独立，将军队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军人阶层在巴基斯坦具有绝对优势的话语权和主导力，这为军人阶层在巴政坛的长期影响创造了条件。从20世纪50年代东西方冷战到21世纪前十年，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主导的中南亚地区战略合作机制中。自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巴基斯坦就成为了美国对抗苏联在中南亚战略影响的前哨站，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纷至沓来。出于对抗苏联以及反恐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一向与巴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提供的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也以军方名义接收。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所谓反恐战争的名义下，进一步加强了与巴基斯坦的战略互动，并持续为巴基斯坦提供安全援助。从冷战后期到反恐战争期间，流入巴基斯坦的巨额援助并没有拉动其国民经济，也没能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品质，而是流向了军方特权阶层及其子女，使之成为除地主阶层外新的精英阶层。这一趋势必然激化巴基斯坦社会本已严重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对立，既助长了民粹势力的意识，又强化民粹团体的大众基础(方金英 2008, 27)。

图2 1990-2017年巴基斯坦人均GDP变化统计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18)

自2001年10月，美国依靠巴基斯坦协助进行反恐战争，大量资金和物资援助进入到巴基斯坦，其人均GDP不断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巴基斯坦的失业率反而大幅上升，说明援助的资金和物质并没有流向巴基斯坦经济领域流通，普罗大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获得感反而减少。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在反恐战争中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包括近7.5万军人和10万平民丧生。经济损失约1231.3亿美元，超过美国同期给予巴方897.3亿美元的援助，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巴国民经济的衰退，这引发了巴国社会的强烈不满(人民网 2018)。长期以来，通过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巴基斯坦中产阶级力量弱小，但政治立场却具有典型的“民粹”特性。英国殖民时期及在独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巴基斯坦社会生产力水平增长有限，与印度爆发的三次战争恶化了综合国力、发展环境。直至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后，巴基斯坦的国民经济才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阶层也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向。一方面，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享受到现代化发展果实的草根阶层逐步向中产阶级过渡且不断壮大。新兴阶层在政治领域自主性意识日益增强，对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政治精英在关注社会公平领域没能有效化解民间的诉求，且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贫富差距使得

中下阶层中分化出一部分边缘群体。这些群体常成为伊斯兰激进势力渗透和发展的对象。国家与社会在消除贫富差距方面的无所作为，直接导致中下阶层在社会秩序之外寻找直接导致中下阶层在社会秩序之外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替代方式，这就为鼓吹实现极端化的、乌托邦式“社会正义”的伊斯兰激进势力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客观上助推了极端伊斯兰激进势力在巴基斯坦的壮大，给巴国政治生态、社会稳定和反恐任务增加不确定性。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巴基斯坦人均GDP开始逐渐上升，但随之而来的地域间、城乡间的贫富差距也迅速扩大。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核试验遭到国际社会制裁，巴基斯坦经济出现困难，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与70年代齐亚·哈克时期相比并没有太多积极改变。20世纪80年代末贝·布托执政期间，巴基斯坦经济有所发展，但大规模腐败问题不仅激怒了社会中下阶层，更使国家形象一落千丈。巴基斯坦曾一度被国际反贪腐组织“透明国际”列入全球最腐败国家前三名。即便到了2017年，巴基斯坦人类发展指数仅为0.562，在全球属于中等偏下水平。

表1：1990-2017年巴基斯坦人类发展指数及其相关经济数据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Expected years of schooling	Mean years of schooling	GNI per capita (2011 PPP\$)	HDI value
1990	60.1	4.6	2.3	3,195	0.404
1995	61.4	5.0	2.8	3,387	0.428
2000	62.7	5.4	3.3	3,451	0.450
2005	63.8	6.5	4.5	4,101	0.500
2010	65.1	7.5	4.7	4,447	0.526
2015	66.3	8.2	5.1	4,978	0.551
2016	66.5	8.6	5.2	5,155	0.560
2017	66.6	8.6	5.2	5,311	0.562

数据来源：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and Indicators: 2018 Statistical Update

进入21世纪，巴基斯坦总体经济增长较快，但与民生相关的农业生产却出现停滞，生活用品物价大幅度上涨，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超过67%的人口依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下阶层在经济上的差异感和剥夺感、对政府的质疑使标榜“社会平等与正义”代言人和倡导者的伊斯兰原教旨或激进势

力赢得了不少边缘群体的支持。底层民众中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其宣传话语，倒向其怀抱，最终沦为宗教极端组织的成员，成为社会安定的威胁。2007年7月，在红色清真寺事件中被巴军警击毙的极端分子拉希德·加兹，曾向记者传递了极具煽动性的口号：“‘统治者们’过着奢侈的生活，而成千上万名无辜儿童饥肠辘辘，甚至得不到基本必需品。”这反映了民粹主义分子存在假借“社会正义”和“人民的化身”走向极端化、暴力化行动的风险，并开始出现与宗教极端思想沆瀣一气的征兆。以巴基斯坦塔利班为主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趁机扩大基层影响力，从巴阿边界的部落地区迅速蔓延并渗透到人口稠密区和大城市，在巴全境接二连三地制造自杀式袭击事件。如今，在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与极端组织呈已现“本土化”的严峻形势。宗教极端势力中有外国人、边境地区的部落民，还有旁遮普人、遭取缔的教派势力和逊派极端组织成员。极端伊斯兰思想和武装组织正借助宗教原教旨宣传和民粹主义群众基础在巴基斯坦不断扩大其社会影响。

## 2. 巴基斯坦民粹主义分析的宗教视角

除了阶级维度外，分析巴基斯坦民粹主义现象，还必须深入伊斯兰宗教文化在巴社会中的影响去探寻原因。伊斯兰教有别于其他宗教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还是一种政治心理。在穆罕默德征服和统一阿拉伯半岛及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非常鲜明，实现了该地区民众宗教身份和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宗教本身所具有超阶级感召力和影响力，在现代社会中与民粹主义的实践手段、动员方式不谋而合。宗教崇拜影响政治心理的形成，是一个民族形成和诞生的精神土壤。伊斯兰文化的民族个性之一是通过宗教令大众产生了对政治的热衷，进而构成了类似于现代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政治心理。不同于其他宗教，伊斯兰教所造就的政治心理难以撼动。即便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伊斯兰教所具有的政治观念有增不减，并在对待现代性负面效应时，还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凝聚力、动员力和解释力。因此，伊斯兰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演变，始终没有脱离传统政治心理和观念的框架，其宗教传统一直支持

着大众的政治实践。

伊斯兰政治底色和民粹主义思潮的重叠可追溯至该宗教发展的初期。前苏联学者拉普绍夫和哈列文斯基在《论早期伊斯兰教的形成》一书中，引用了美国著名伊斯兰问题学者艾斯波西托(John L. Esposito)的观点，即伊斯兰教是麦加商业社会演变的必然产物，并从其形成之初就显现出强烈的政治目的性(B.A.拉普绍夫、N.B.哈列文斯基 2001, 247)。这个政治目的性就是试图构建更大范围的身份共同体，阻止阿拉伯社会的阶级化。在伊斯兰教产生初期，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生态呈现的是无政府状态，生活方式上是世俗和物质主义的。这种状态在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中都占据绝对优势(P.M.霍尔特等 2001, 248)。麦加商业活动的广泛发展造成了系列社会问题，包括贫富分化、重利轻义和道德水平的普遍下滑。伊斯兰教就是基于消除这一状态，也是对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回应。然而，穆罕默德在面对社会激烈动荡的现实之下，仅仅以一个预言者作为其传教初期的角色，告诫沉溺于金钱和权势的人们“回头是岸”并参与到维护古老传统和道德秩序的行为中。这种单纯的宗教劝诫不但无效，而且使伊斯兰教与当时的社会制度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麦加的信众遭到贵族阶级的迫害，这迫使穆罕默德向北前往麦地那继续其传教的是使命。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也从对理想社会的宣传、道德伦理的规劝转变为构建理想社会的实践，从而开启了伊斯兰教政治化的步伐，并形成了两点原则：第一，伊斯兰教既是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力的共同来源。第二，管理社会的力量是信仰(托马斯·李普曼 1985, 59)。作为政治动力的源泉，伊斯兰教已被验证是政治化的宗教信仰。

随着时代的演变，伊斯兰宗教意识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宗教社会与阶级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中世纪以来，伊斯兰教作为近东地区的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逐渐趋于保守和僵化，对外部世界变化的适应愈发困难，进而演变为借助“宗教”维护世俗权力和统治秩序的手段(哈全安 2007, 30)。19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宗教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解释。从阶级社会的角度看，诸多宗教在阶级社会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是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与阶

级斗争的产物而共存。一方面，宗教作为特定经济基础的思想上层建筑，是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是统治阶级维护权力的封闭性和麻痹民众斗争精神的“鸦片”。另一方面，宗教宣传中有关苦难的论述，反过来又会激励民众对统治阶级所造成的现实困难表达抗议，即“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这种抗议最终将演变为阶级斗争下的革命浪潮。在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宗教为民众反抗现实苦难提供神圣的“合法性”和“权力天授”，构成了社会革命的外在形式(哈全安 2017, 456)，构成对“社会公正”追求的具体行动。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源于伊斯兰世界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裂变和诸多矛盾集合的再次回应。

由于伊斯兰教传统中存在着与现代社会政治理念相契合的内容，因此，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认知和实践条件。在伊斯兰教早起的政治实践中，协商原则一直被其看作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伊斯兰教自诞生以来，就存在着信众参与集体事务协商的传统，从权力的结构上更体现为宗教影响下的权力扁平化。阿拉伯国家中的“舒拉”就是这一传统的延伸。穆斯林社会认为，先知穆罕默德和正统哈里发时代是法治与协商最好的时期，且先知是伊斯兰政治且先知是伊斯兰政治协商的开创者。鉴于此，穆斯林政治理想主义者对于这一传统推崇备至，并认为伊斯兰政治传统始终存在大众参与的“公议”原则。这也就不难解释，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所倡导的思潮与这一传统的接续，与民粹主义所提倡的“去阶级化”和“大众化”的权力诉求不谋而合。人的物化、社会的阶级化和现代化进程也成为伊斯兰政治思想批判的领域，导致普罗大众特别是在现代化进程被边缘化的群体将理想化的伊斯兰政治文化传统作为回应“被剥夺感”的手段，成为伊斯兰民粹主义思潮的内核。

19世纪后，启蒙运动、世俗化、理性和工业化进程在全球范围不断扩溢。发端于西欧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带来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也极大地动摇和冲击了伊斯兰世界的传统秩序和意识形态。伊斯兰世界关于宗教社会变革的思考开始从精英层面扩展到了大众层面、从意识形态领域扩展到了权力政治领域。传统宗教理念是对应于传统社会长期的生产关系性质，两者处于共生的状态。传统的宗教学者既是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塑造

的参与者，又是传统秩序中的得益者和捍卫者。现代伊斯兰思想是对该宗教思想的“价值回归”，即强调《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信仰原则和早期历史实践，崇尚哈里发国家之共和政体的社会秩序，从而将原始的“自由民主”和“民众参与”两方面内涵结合到应对西方现代性的思考中，实则起到了“托古改制”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伊斯兰主义，虽有“现代”之名，却存在着原教旨主义倾向，从而形成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核心内容在于借助回归原教旨的传统宗教形式而倡导绝对平等和大众民主的政治参与，挑战世俗威权政治倾向非常明显，进而与现代政治理念产生某种奇特的关联。历史上，伊斯兰教世界长期有假借复古之名而行变革之实的传统。正如马克思所言，“宗教革命”……是一种表面上的反动，是一种虚假的复古和返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 250)。伊斯兰激进主义则将这种传统进一步融入实现所谓理想化、民粹化社会形态的极端行动中，并最终实现三大目标：主张以完整的伊斯兰教体系改变现实社会而非顺应现代化；强调运用宗教手段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并视“伊斯兰教”为最终解决方案；积极干预世俗政治，通过暴力方式实现政教合一的、沙里亚式的社会。从现代政治参与和当代中东穆斯林社会的现状来看，宗教参与和影响国家政治有三种形式：无感参与、被动参与和激进参与。其中，激进参与被视为20世纪70年代宗年代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重要政治运动形式。由于这种政治参与形式通常伴随着激烈冲突、社会的撕裂和暴力的滥觞，通常也被称为破坏性政治参与，例如成立秘密团体或非法武装组织，通过恐怖与暴力来宣扬其政治诉求，其结果必然是社会长期混乱与和平的遥遥无期。

上述现象的出现反应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伊斯兰政治思想中的理想化成分在现代社会得到了延续。原教旨主义者力图以基本教义中相关概念的不变，去回应大千世界的变迁。第二，在大众眼中，现代化进程在伊斯兰国家的发展与伊斯兰教义所描绘的理想世界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刘靖华、东方晓 2001, 257)，由此在心理上给人们一种明显的“挫败感”和“边缘感”，这为与当代民粹主义的“正当性”赋予了宗教层面的认可。民粹宗教化是当代穆斯林社会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巴基斯坦作为处于

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正视并引导大众的宗教情绪，使之融入到现代社会政治参与程序中，对于消除宗教极端主义、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

### 3. 巴基斯坦民粹主义分析的地域视角

巴基斯坦民粹主义除了宗教因素外，地域因素也占据较大影响。在英印殖民统治时期，殖民当局与各地区之间就存在着权力的博弈。各地区始终致力于获得更大的自治权。巴基斯坦在1947年分治以及随后的建国过程中，曾相当长时间面临如何构建统一的国家身份、文化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困境，也面临着培养具有全国视野、具有担当的领导人物。20世纪50年代一体化运动强力推行，导致西巴基斯坦的区域主义和次国家身份认同被唤醒，加剧了诸如“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俾路支分离主义”问题等。

巴基斯坦伊斯兰传统社会结构决定了个体对宗教、家族和更小范围地域等的忠诚度超过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度。长期以来，生活在穆斯林地区孟加拉人、旁遮普人、俾路支人、普什图人、信德人有着各自的文化传统、语言习惯，这些差异构成了相当程度的地域认同。曾作为巴基斯坦人口比重最高的孟加拉人，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同印度和东南亚有更密切的联系。这使得孟加拉文化同以上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似性超过了同巴基斯坦西部之间的文化相似性。东西巴基斯坦两个部分在巴独立前并没有共同的经济、文化、国家身份建构发展的经历。巴基斯坦独立后，相隔数千公里的地理相隔数千公里的地理距离，导致两地民众与社会的文化联接较弱。巴政府在推行一体化政策后，将主要发展重心放在了西巴基斯坦，与东巴地区难于形成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区域间信任的缺失导致分离主义倾向(Louis Hayes 1984, 22)，并最终导致第三次印巴战争后孟加拉的独立。1971年孟加拉独立后，旁遮普人取代孟加拉人，成为巴基斯坦的主体民族，但分离主义对巴基斯坦影响并没有停止。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以旁遮普为地域认同的人群逐渐在军队和中央政府中占有优势，在发展资源分配上更具主导权，从而造成所谓旁遮普精英形成与信德人、普

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的疏离感、差异感，引发族群间的失落感和对立情绪，间接地阻碍了巴基斯坦国家身份意识的建构。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后，巴基斯坦联邦中央与各省在财政税收的分配、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行使、发展资源的配置等方面的零和博弈加剧，即央地围绕着权利的分配矛盾较为突出。其中，旁遮普省在发展资源分配、行政资源分配等上占有明显优势，逐渐形成了以旁遮普地区为核心的国家政治经济结构。旁遮普人在资源、权力等领域的分配占据绝对优势，国外直接投资也主要用于旁遮普省或者讲乌尔都语的人口聚居区的经济发展。这也就使得旁遮普的发展水平远强于巴其他地区(张华琴，刘成琼 2008, 84)，联邦内部成员的发展程度不平衡加剧，导致区域化利益团体的形成并固化。因此，利益团体的区域化也是导致巴基斯坦区域民粹主义形成的原因之一。巴基斯坦各地的利益团体往往只代表本家族、本地或本省的狭隘利益。家族私利以及个人意识超过了公共利益和公民意识的形成(Peter Blood 1995, 77)。曼里拉扎曼在对巴基斯坦社会进行分析时，认为巴国社会横向层面存在着族群、语言和地区集团势力的多元化；而在纵向层面上，精英阶层同普通民众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巨大鸿沟(Maniruzzaman Talukder 1982, 63)。曾经的西方化精英阶层领导了巴基斯坦独立运动和建国进程，却没有能够解决社会长久以来普遍存在的各种内部矛盾。阿苏·甘地认为巴基斯坦长期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巴基斯坦缺乏整合全国各区域的、普遍性的政治文化(Ashu Gandhi 1997, 113)。第二，族际矛盾和区域主义长期植根于传统宗教文化中，导致诸如世俗社会中平等、自由、诚信、合作这些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必需的政治文化概念无法在普通民众之中扎根和普及。由此带来的便是附着在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下的地区分离主义滥觞。由混杂着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武装组织，利用民粹主义带来的影响，吸引中下层社会群体参与，成为巴基斯坦社会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这些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主要集中在俾路支省和信德省，呈现明显的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结合。截止到2016年，这类武装组织已发动了约131次恐怖袭击。目前主要分离主义组织包括：

(1)“俾路支斯坦解放军”，该武装组织以俾路支斯坦省东部、中部和北部为主要活动区域。(2)“俾路支共和军”，该武装组织以德拉·布格提、纳西拉巴德、德拉·穆拉德·贾迈利、巴尔坎、罗拉拉伊等俾路支省内为主要活动区域。(3)“俾路支虔诚军”，该组织主要活动在迈克兰地区，该地区靠近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4)“俾路支解放阵线”，该组织活动区域遍及俾路支斯坦全省，以南部沿海的迈克兰地区以及毗邻的阿瓦兰地区和中部的胡兹达尔地区为主。(5)“信德解放军”，该组织主要在信德省各地活跃，主要针对政府、外国投资机构发动恐怖袭击(搜狐网2017)。

上述非法武装组织之所以能够长期生存，既有极端宗教意识形态操纵下的“向心力”、又混杂着民粹主义煽动下对现代化进程的对抗，更有基于中下阶层中部分边缘群体利用极端手段反抗社会的不公，还有基于联邦与地方之间特定地域的分离主义。以民粹为特征的宗教激进主义，已经成为巴基斯坦经济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巨大障碍。

## V. 结论建议

中巴两国的深厚友谊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展开的各项合作提供了政府层面的巨大支撑，也使中国和巴基斯坦正继续向着既定目标前进。但是中巴围绕“一带一路”的各项合作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安因素。从外部而言，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掀起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逆流横行的背景下，民粹主义区域性色彩日渐浓厚，带来的消极影响愈加严重。从内部而言，巴基斯坦一些地区的民粹主义组织如俾路支省、信德省、吉尔吉特等地区的民粹主义逐渐抬头，其中一些地区的组织还有着一定的恐怖主义性质。这些组织影响着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同时也影响着中巴两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在当前很有必要加大对巴国民粹主义研究的力度，起底其产生根源、成长过程，并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在现存的民粹主义研究理论并不能精确解释巴基斯坦民粹主义的各种现象和产生根源等问题的背景下，本文突破了一维研究的界限，

创造性的使用了三维视角分析的方法，从宗教、民族和阶级三个层面来把巴基斯坦的人、思想和空间三个维度来剖析巴基斯坦民粹主义，从而得到了结论如下：

首先，从阶级视角来看，巴基斯坦有着鲜明的阶级对立特征，统治阶级、精英阶级等核心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边缘人群等被统治阶级的对立是造成民粹主义的重要土壤。

其次，从宗教视角来看，现代伊斯兰主义存在原教旨主义倾向，导致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可能被宗教极端势力利用，从而不断扩散民粹主义。

最后，从地域视角来看，地域社会对于家族族群的忠诚度超过对国家的忠诚度，地域族群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存在严重的冲突，这导致了地区分离主义形态的民粹主义泛滥，成为威胁巴基斯坦社会安全和国家稳定的主要毒源。

巴基斯坦民粹主义虽然不是影响中巴关系和围绕“中巴经济走廊”的两国合作的最直接因素，但却是重要的源泉，其民粹主义的走向也将对两国关系和两国合作带来深远的影响。做为巴基斯坦的好邻居和好伙伴，中国首先需要看到巴基斯坦在阶级层面、宗教层面和地域层面的重重矛盾，在和巴基斯坦国内进行合作交流的时候，必须要避开这些雷区，避免介入这些层面里的各种利益冲突。其次，中国在进行“一带一路”有关宣传时，需要照顾到各个阶层、宗教群体和地域群体的利益关切，寻找共同的利益点来打造共赢之路。最后，中国要鼓励巴基斯坦各方采取对话协商来推动问题的解决，并致力于推动各方的民生发展和经济建设，并要做好防范民粹主义的各项预防措施。

<参考文献>

- [美]托马斯·李普曼. 1985.《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北京：新华出版社。
- [英]保罗·塔格特著，袁明译. 2005.《民粹主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0页。
- B.A.拉普绍夫、N.B.哈列文斯基. 1982.《论早期伊斯兰教的形成》，《历史的问题》，第11期。转引自刘靖华、东方晓. 2001.《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一版，第247页。
- P.M.霍尔特等编. 1970.《剑桥伊斯兰史》，第1A卷，第33页。转引自刘靖华、东方晓. 2001.《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一版，第248页。
- 刘婧. 2016.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为新疆发展强大引擎”，《中国在线》。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xj/2015-04/24/content\_20535009.htm.
- 刘靖华、东方晓. 2001.《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一版。
- 方金英. 2008.《从社会阶层角度解读巴基斯坦的政治生态》，载《现代国际关系》，第27页。
- 搜狐网. 2017. “巴基斯坦安全形势及其对我国西部的影响”，[https://www.sohu.com/a/203164636\\_389790](https://www.sohu.com/a/203164636_389790). (上网日期：2019年5月24日)
- 人民网. 2015.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举行会谈”，<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421/c1024-26876060.html>.
- 人民网. 2018. “反恐议题凸显美巴关系裂痕”，<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105/c1002-29746293.html>.
- 张华琴，刘成琼. 2008.《巴基斯坦政治文化发展探析》，载《南亚研究季刊》，第2期，第84页。
- 哈全安. 2007.《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基本特征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载《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第30页。
- 哈全安. 2017.《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56页。
- Blood, Peter. 1995. “Pakistan, A Country Study.”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 Freedon, Michael. 1998. “Is Nationalism a Distinct Ideology?” Political Studies, Vol.46, No.4.

- Gandhi, Ashu. 1997. “Some Aspects of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India and Pakistan : A Comparative Stud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 Hayes, Louis. 1984. “Politics in Pakistan ,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 Kim, Hyunjung. 2013. “An Analysis on the EU's FTA Strategy by Framework of Three-level Games Theo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search, Vol 16, No. 2, 2013.
- Laclau, Ernesto. 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 Populism.” NLB.
- MacRae, Donald. 1969. “Populism as an Ide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dde, Cas. 2004.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39, No.4, p547.
- Mudde, Cas. 2007. “Populism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rif. M. Shuja. 2000. “Pakistan: Feudalism: Root cause of Pakistan’s Malaise”, <http://www.newsweekly.com.au/articles/2000mar25pfrcomp.html>.
- Talukder, Maniruzzaman. 1982. “Group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Changes: Studies of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New Delhi: South Asian Publishers.
- The Static of Tehrik-i-Taliban Pakistan (or suspected) attacks in Pakistan since 2007, GT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UNDP. 2018. “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and Indicators: 2018 Statistical Update” , [http://hdr.undp.org/sites/all/themes/hdr\\_theme/country-notes/PAK.pdf](http://hdr.undp.org/sites/all/themes/hdr_theme/country-notes/PAK.pdf).
- World Bank. 2018.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pakistan>.

투고일 : 2020년 7월 27일 . 심사일 : 2020년 9월 22일 . 게재확정일 : 2020년 9월 29일

\* Bo Tu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illa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at Kunming Institute for Advanced Information Studie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economy, and The “Belt and Road”.

<Abstract>

##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of Populism in Pakist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Bo Tu  
(Silla University)

Bilateral profound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and the "all-weather strategic partnership" have given great support to mutual cooperation. China and Pakistan are moving forward to the goal of "economic corridor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er, Gwadar por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energy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s the points to form the '1+4'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also facing some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mong which the populist in Pakistan is gradually emerging. If left unchecked, it may lead to a great threat to CPEC and other cooperation.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 on populism in Pakista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the all-weather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and ensuring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CPEC. After reviewing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deficiencies of populism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populism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ocial classes, religions and regions, so a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breeding source of popu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 populism in Pakistan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 antagonism. From a religious perspective, there is a deeply rooted political psychology among the Pakistani people.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of Islam in Pakistan determines that the loyalty of individuals to religion, family and a smaller region is greater than the loyalty to the nation state.

**Keywords** : The "Belt and Road", Pakistan, Populism, Three Dimensional Analysis,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